



【故地往事】

邾国故城：保存较完整的东周都城

□吴济夫

邾国故城，俗称纪王城，位于济宁市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地处峰山南麓，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纪王城源于唐太宗李世民，他第十个儿子李慎的封地在邾国故城遗址上，因其封号为“纪王”而得名。

早在2600年前的春秋时期，这里就是邾国的都城。据《史记》记载，黄帝之孙颛顼的后裔陆终生有6子，第5子名晏安，大禹赐封在曹国(今菏泽一带)，以国名为姓氏，此为曹姓始祖。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元年)，曹氏后裔曹挾去邾地建立邾国，附庸于鲁国。

邾国名字的由来，据《滕县金石志》记载：“清道光十年，城东北八十里凤凰岭涧沟中，出土了伯俞父诸器……其中鬲、盘、匜等铜器铭文中，皆有邾字。”

邾国的“邾”字，无论在西周还是春秋时期的铜器铭文中，都写成现在的“𡗗”字。而在春秋以后的文献中，邾娄、邾、邾、邾，指的都是邾国，由于古人发音的差异，造成了史料记载上的一些不同。

著名学者王献唐在其著作《邾分三国考》中，说到邾国的疆域大概为：“邾，在今邹县中部、南部，济宁东境，滕县北境，东、西、北三面界鲁”。

邾国曾为鲁国的附庸，与鲁国接壤，而且“击柝之声相闻”。春秋初年，邾国一直被鲁国所轻视。直到邾国第十代君主曹克在位时，他向齐国靠拢，为齐桓公成就霸业东奔西走。齐桓公称霸时，向周僖王求请，封了子爵的名分，邾国开始位列诸侯。

邾国不甘被鲁国欺辱，出师伐鲁，鲁僖公竟然“不设备而御之”。两军交战于升陞(地名)，鲁国大败，“获僖公冑，悬诸鱼门”。

公元前627年，为报升陞战败之辱，鲁军征伐邾国，夺取了訾娄(今曲阜市息陞凤凰山下大律村一带)之地。訾娄离鲁国很近，极不安全，因此邾国迁都于邾瑕(今济宁市南5公里处的唐口镇)，这里地势低洼，常遭水灾侵害。

公元前666年春，邾宪公卒，邾文公即位。邾文公在位52年，是邾国在任时间最长的一代国君，他的最大贡献就是迁都。

据《左传》载，鲁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迁于绎。”就是说，将邾国国都迁到峰山之阳，这是顺乎民心之举，但是卜辞上说，迁都利于民，有害于君，会使君短命。当时的人是很相信占卜，纷纷劝阻迁都。邾文公却说，上天树立了君，就是为了替民谋利，至于我的生命如何，这是天意，如果迁都利于民，就迁吧。他毅然将国都由邾瑕迁至峰山之阳，避免了水淹之灾，减少了战争之苦，邾国从此经济发展、国泰民安，然而，过了不久，

邾文公真病死了。

到了战国中晚期，穆公曹路任邾国国君，他是邾文公之后，最为时人及后人称颂的英明君主。

穆公即位之初，正值邾国与鲁国发生战争，邾国付出沉重代价。穆公犹豫不决之时，向孟子请教，这就是“穆公问政”著名典故。

《孟子·梁惠王下》中就有穆公向孟子问政，孟子劝谏穆公行仁政的记载。在《孟子》、贾谊《新书》、刘向《新序》等书中都有穆公的政绩记载。

经过穆公的治理，邾国国力增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良好，出现了“路不拾遗，臣下顺从若手之投心”“鲁卫不敢轻，齐楚不能胁”的繁荣局面。邾穆公为显示其政绩，便改邾为邹。

峰山之阳地理形势优越，易于防守，这里土地肥沃，适于发展农业生产。自从迁都后，邾国经济得到发展，这也奠定了邹城古代行政区划的基础。

据《左传》《史记》《汉书》等古籍记载，西周始封邾，至29世为楚所灭，在此建都400余年。邾国被灭后，邾国故城仍为当地政治、经济中心。秦置邹县，属薛郡，汉属鲁国，历经晋、刘宋、元魏，直至北齐年间迁徙徙山之阳，邾国故城逐渐沦为废墟。邾国故城自春秋建立，至北齐迁徙，共延续了1100余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代都城。

邾国故城占地面积约6.32万平方米，现残存城墙总长7200米，有土筑、石砌、夯层坚硬、层次分明，城墙高2至3米，最高处达7米，墙基一般宽3至4米，虽历经沧海巨变，仍巍然屹立。

邾国故城是我国现存较为完整的东周时期都城之一，城内出土文物甚多，大多带有文字，因此具有重要的考古研究和历史价值。

考古工作者在邾国故城内进行文物调查、考古发掘，陆续出土和发现了一批独具特色的文物，数量达400余件。时代从春秋至汉代，种类包括铜礼器、铜兵器、陶器、铁器、印玺等。铜礼器中有盘、鼎、豆、盆、舟、匜等；铜兵器中有剑、戈、戟、矢镞、弩机等；铁器中有锄、犁、镢、铲、铧等；陶器有陶鬲、陶罐、陶豆、陶盆、陶瓮等。另有重要文物，如秦诏文陶量、东周至秦汉时期陶文等。其中，陶文多达3000多件，它们有的刻于盆、罐口沿和肩外侧，有的刻于豆柄中部和器座上。

2017年3月至7月，由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组成的考古队对官殿区的“皇台”展开了发掘，出土遗迹包括灰坑270余个、沟渠10条、水井4眼，还有房址、窑炉等。出土大批遗物，其中陶器有鬲、孟、豆、罐、盆、瓦、瓦当、砖等，铜器有新莽铜器8件，以及钱币、印章等。遗存的年代多数属于春秋、战国、汉代。

□赵瑞峰

【史海钩沉】

峰县李克敬与曲阜颜氏后人

李克敬(1659年—1727年)，字子凝，号小东，清代山东峰县人。

李克敬曾在殿试中考中二甲第九名，官至翰林院编修，还参加过《大清一统志》和《峰县志》的编修工作。

据《峰县志》录《翰林院编修李克敬墓碑》记载：“岁丁亥，圣祖仁皇帝南巡，进诗台庄水次，时献诗赋者六七百人，进呈二十一卷，钦拔(李克敬)第一。”

李克敬自幼聪颖，有文名，但科举不利，他先后在家乡和临沂、徐州、曲阜、济宁等地教书。康熙四十六年前后，他曾在曲阜教书，学生都是颜氏子弟。

颜氏当时是鲁国望族，自复圣颜子(颜回)之后，世居曲阜的颜氏后人“赍续先祖圣训，重儒笃学，文人踵兴，累世有集，一门称盛”，颜光敏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李克敬所教学生多为颜光敏的子侄(孙)辈，如颜肇维、颜懋伦、颜懋乔等，也有与颜光敏同辈而年龄较幼者，如颜光敏叔父的季子颜光教。

颜光教，字东模，庠生，他的父亲颜伯珣(1637年—1710年)，字石珍，一字季玉，号相叔，恩贡生。

颜伯珣历任寿州同知，著有《祗芳园集》《旧雨草堂集》。他长于诗才，一生写诗五百多首，并把自己的诗集定名为《祗芳园集》。颜伯珣生前曾对自己认为重要的作品进行了初步编辑，写了自序，这就是抄本《祗芳园集》上中下三集，由后人编辑的《颜氏三家诗集》就是颜伯珣、颜光敏和颜懋乔的诗作合集。

李克敬在曲阜教书期间，颜伯珣正在寿州任上，两人无缘见面，但李克敬曾于颜光敏乐园壁上看到过颜伯珣的诗。康熙四十九年，颜伯珣故于寿州，回曲阜安葬，颜光教请李克敬撰《颜伯珣墓志铭》。

康熙五十八年至康熙五十九年间，在颜伯珣去世九年后，其子颜光教将“手写全集”，请当时在京未久被劾，继而回峰县归养的李克敬作序。

李克敬欣然应命，于用心拜读后，以崇敬之情写下了《祗芳园集序》：“往岁海内盛传《十子诗略》，其为颜吏部公，先生之犹子也。余昔于其乐圃壁间得读先生诗，疏古瘦硬，峭僻绝俗，意其幽好自喜，不屑仿人者也。后又闻先生诸孙说先生佐州，况甚冷，时时取诸家以自给，日苦吟不辍。因慕见其光仪不可，得味其诗，如或遇之。先生之季子与余游，手写全集畀余为之序。余受而卒業，观其自序，乃谓以杜为学，且云声音笑貌动而相肖，不知其所以然。今遍观其诗，无规摹少陵之

迹也……先生以河间贵公子，有良田广宅足以自娱。余尝观于其祗芳之园，周览其池阁竹树之美，慨然太息，谓人生有此，南面王岂屑易哉！而先生顾去而远从薄宦于数百里外，不调者二十年，禄奉不足自养，至鬻产以辅之。其亦何取于彼而不归耶？今读其诗，梦寐乡井，顾念林丘，无日不思归来之计，而牵绊沮抑，赍志以终。篇章益富而运途弥迤。此谁为为之？谓非诗之穷人不得也。以余之不才，早嗜吟咏，于先生之诗无能为役也。而须白眼暗，跋扈泥涂，真如放翁所称‘诗不能工浪得穷’者。论先生之诗，旋顾影自伤焉。不禁投笔而三叹矣。峰阳后学李克敬拜序。”

在序中，李克敬赞颜伯珣的诗：“……疏古瘦硬，峭僻绝俗，意其幽好自喜，不屑仿人者也。后又闻先生诸孙说先生佐州，况甚冷，时时取诸家以自给，日苦吟不辍。因慕见其光仪不可，得味其诗，如或遇之。”

同为《祗芳园集》作序的孔贞瑄说其诗：“石珍早年游金陵，为诗风流跌宕，脱口而出，不事雕琢。晚年乃臻平淡静深之境。今读其诗终卷，如对数十年面壁老僧，令人矜骄之气不涤自净。”陕西泾阳张姓评论家则说：“五言古体每篇必险峭刻厉，正如鲁公书法，铁画银钩，一笔不肯犹人平近，就中风味弥长耳(刻本《祗芳园遗诗·赠言》)。”

李克敬等人的说法或有所溢美和片面，但至少在某一方面和某种程度上抓住了颜伯珣诗的一些基本特征，是值得珍视和参考的。

李克敬在序中说颜伯珣“以河间贵公子，有良田广宅足以自娱。余尝观于其祗芳之园，周览池阁竹树之美，慨然太息，谓人生有此，南面王岂屑易哉！”即使有夸张的成分，也可见颜伯珣的生活质量是很高的。

按世俗的眼光看，已是晚年的颜伯珣对于这个做官的机会，原本是应该放弃的，因此《颜氏族谱》说他“初隐泗水上，弹琴赋诗，有终焉之志。晚以圣恩倅寿州，人皆为愤惜，夷然处之”。

像颜伯珣这种读圣贤书出身的人，天生具有强烈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理想，对官职的大小可以夷然处之，但对于报效国家的机会却不会轻易放弃，因此李克敬在《祗芳园集序》表达了不解，但也暗含某种敬意。

李克敬作此序时年届花甲，又值在京未久被劾，辞官归养乡里不久，自念身世遭际，不能无情，遂于序尾写下“须白眼暗，跋扈泥涂……论先生之诗，顾影自伤焉。不禁投笔而三叹矣”这样沉痛、是伤人亦是自伤的话。

投稿邮箱：qlwbrwql@163.com